

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江西元◎著

大国“信”什么？“求”什么？凭何以“求”？

如果说，自古西方人一直在神人之间游走，俄罗斯人在天使与野兽之间徘徊，日本人在海洋与大陆之间张望，中国人则徜徉在东亚大陆山水之间，悠悠然，上下五千年！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江西元◎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 江西元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17-1169-4

I. ①大…

II. ①江…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2349 号

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丽芳

编辑信箱 shymeme@sohu.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49 (编辑室)
(010)66130345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52612332 (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大国文化要义（代序）	37
第一节 大国精神与灵魂	37
一、文化精神与灵魂	37
二、中西精神与灵魂	45
三、俄罗斯、日本精神与灵魂	49
第二节 大国意志与文化秉性	59
一、中国意志与文化秉性	59
二、西方意志与文化秉性	64
三、俄罗斯意志与文化秉性	73
四、日本文化意志与秉性	80
第二章 西方外交文化本原	101
第一节 “物”、“神”、“我” 三位一体	101
一、理性主义二元论	101
二、个体主义主体性	104
三、上帝与“神人之争”	107
四、二元对立世界图式	112
第二节 从“重力”、“尚斗”到理性的非理性主义	118
一、“重力”、“尚斗”的原始价值取向	118

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二、理性的非理性主义	121
三、理性、上帝和法的合一	128
第三章 俄罗斯外交文化本原与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133
第一节 俄罗斯外交文化本原	133
一、从自然、上帝到“神人”整体主义二元本体之思	133
二、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聚议性”	151
第二节 俄罗斯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161
一、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历史轨迹	161
二、俄罗斯战略文化特性	176
三、俄罗斯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187
第四章 日本外交文化本原	199
第一节 从自然主义神（皇）、“天”、“道”，到神秘主义“绝对无” 之“我神”	199
一、自然主义神（皇）、“天”、“道”本体之思	199
二、从“绝对无”到“我神”神秘主义本体之思	214
第二节 从“理”、“气”、“一元气”，到“心”、“孝”、“诚”、 “直”	223
一、理性主义之“理气”一元论与“一元气”本体之思	223
二、从“禅”、“明”之“心”、“孝”，到“儒”、“神”之 “诚”、“直”	229
第三节 日本战略文化特性及其变化趋势	241
一、尚武、好战性（武士精神）	241
二、阴柔、残暴性（町人根性）	250
三、间人、排他性（岛国根性）	255
四、日本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259
第五章 中国外交文化本原	263
第一节 中国外交文化本原	263

目 录

一、整体主义一元“天、道、仁”之思.....	263
二、从“厚生”到“礼不往教”	275
第二节 从“藏天下于天下”，走向“中西融合”	281
一、从“天下主义”到“藏天下于天下”	281
二、从找回“自性”走向“中西融合”	293
后 记	305

导 论

一、大国文化要义

文化的内核是一种精神特质及在这种精神熏陶下产生的灵魂、秉性、思想和智慧，其第一要义是精神和灵魂，即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无”与“有”。一般而言，人的精神始于“无”，基于“信”，定于“一”。即精神生于“无”，灵魂出于“有”，精神与灵魂合在一起归于“一”^①。也可以说，精神是建立在人的观念世界（“无”）之上的“存有”，而灵魂则是在现象世界（“有”）之上而形成的“无”或“无”中之有。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无”，是人在思考一切与人的终极关怀相关问题时所确立的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其根本意涵，指的是人的精神、理念中，指向未来和彼处之“存有”、“存之有”或“有之无”。“无”的观念显示了人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之“实然”，而是要超越当下和眼前的所见所闻，追求“未然之物”和“应然”的生活。而“无”与“信”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凡“信”即“无”，或者说“无”即“信”，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信”者“无”也，或“信”者“有”也。因为，一切思想观念，都是信者“有”，不信者“无”。即所谓“无信不立”。而归根结底，“信”又是建立在“一”这个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

在人类文化精神发展进程中，印度、中国和古希腊等代表的世界主要民族文化精神都建立在将世界抽象为“一”（世界图式）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但这个“一”在不同文化中的规定性是不相同的，各有其自己的特定内涵。如，中国文化中的“一”，指的是一个从“无”到“有”，又

^① 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或“实在”。

从“有”复归于“无”的大化流行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世界上一切个别存在的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着的整体一元存在。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一”也可以理解为“无中之有”或“无中‘自’有”，即，“有”归于“无”的“自有”的整体存在。中国古代先哲用“无极”、“太极”、“太和”、“一元气”、“天”、“道”等词语来表述这个“自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然之有”。中国文化自古崇尚“惟精惟一”和“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①，强调“万物归一”。

在西方，古希腊人早期信奉的“一”（天人合一）逐渐地发展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即是说，古希腊思想家在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辩证法将它们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所独有的“一”。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一”不像中国和印度文化精神中的“天”、“道”、“大梵天”、“梵我合一”或俄罗斯和日本文化精神中的“神我”、“我神”等“整体一元”的观念存在。这个“一”实际上指的是“有”与“二”，即，有一个终极物质存在和一个精神性存在；现实世界既是人的世界也是神的世界；人既是“物”又是“精神”存在。这样，围绕世界是同一、统一于精神还是物质，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精神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为克服西方文化精神中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古希腊思想家提出了辩证的“逻各斯”的同一思想，即，“物”与“我”（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二元的各自发展，通过“逻各斯”这个中介达到和实现“同一”。因而，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地说，就是“逻各斯”的“求一”、“求同”精神，西方哲学也称之为“同一哲学”。换句话说，西方人精神上所追求的“一”，就是能够将物质与精神结为一体的“逻各斯”的同一。而对俄罗斯和日本神本主义者来说，这个“一”就是整个世界万物都源于斯、归于斯、统一于斯的神、上帝等诸如此类的精神存在。此外，在俄罗斯与日本，“一”还具有以下意涵：其一，它指的是“神力”，即，代表自然力的神秘的诸神祇。自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神本之思是俄罗斯、日本文化精神最根本的底色。其二，它指的是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神的无”和“神我”，或日本现代哲学之父西田几多郎的“绝对无”和“我神”。其三，在俄罗斯，它还意味着对基督教世

^①（春秋）老聃、（战国）庄周：《老子·庄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界主义，即，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普遍承认^①，以及将俄罗斯民族视为上帝唯一选民，具有拯救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意识的价值肯定。而在日本，“一”还意味着与俄罗斯人普遍信奉的基督教世界主义相反的“日本特殊主义”。其表现，主要是强调与“尊皇”观念和“皇国”至上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万叶精神”^②及由此精神衍生的复古神道、日本精神、日本主义、国家主义、国家神道等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

建立在全民之“信”基础上的任何民族、国家文化精神都具有特殊性、内生的普遍性冲动与片面性这三个根本的属性。而文化精神所内生的普遍性冲动及其片面性，又是造成人类历史上无数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根本动因之一。就“信”而言，我们认为，毛泽东诗云“人间正道是沧桑”，或中国俗语说的“沧海桑田”，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中一个最根本的“信”。中国人文精神肇始于《易》。南怀瑾在总结他毕生所学时指出，他一辈子学到的东西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即“易”，即是说，这个世界上最为根本的“存在”就是“易”，或世界就是“易”，除了“变”、“易”、“化”什么都没有。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精髓也是如此。它主张人要参与到社会、世界的变化过程之中，以改变现成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的理论。除了“易”，对“和”与“合”之“信”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第二特质。如《周易》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③基于“变易”与“和合”精神，中国人自古讲究知行合一、顺乎时变和因革损益，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④，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⑤，追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以达致“天下治”。^⑥同时，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无神论与泛灵论共存，并

①（俄）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② 主要指的是：尚武之心、正直之心、自然之心。

③（春秋）老聃、（战国）庄周：《老子·庄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④ 同上。

⑤ 《国语》史伯之辨。

⑥ 《荀子·礼论》。

行而不悖。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上层统治阶层和士大夫实际上信奉一种无神的泛神论；另一方面，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自古至今一直广泛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泛灵崇拜。即是说，中国人的宗教心与精神向度具有“泛神的无神论”和“有神的泛灵论”这样的二重性。^①

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信仰不同，西方人在精神上有三个根本之“信”，即他们“信理”（抽象的逻辑思辨，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信神”（上帝）和“信法”（罗马法、自然法），因而，“理性精神”、“上帝意识”和法治精神这三个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了三元共存、共享、共分天下的基本格局。具体而言：（一）执著于对客观事物寻根究底的理性精神是西方人文精神最根本的特质之一。西方文化建立在理性精神基础之上，尤其是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是西方人自古以来，尤其是在近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中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产物，代表了人类认识世界能力上的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但在西方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性主义批判哲学早已指出，作为主体性基础的人类理性，本身不是绝对的，它不仅受到种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支配，更有其不可超越的历史性。^②因而，人的理性（科学理性）既无法从整体上说明人类活动的意义，也不能为人类提供有终极目的的知识，即是说，人仅凭科学理性“不能够理解生命”。^③（二）“西方人身上的高尚性、超越性，总是与某种神的观念相联系的，而这种神的观念”又“被对象化为人之外的绝对权威”，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反而成为人精神上的桎梏”^④。在西方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斐洛通过强调神人之间的绝对间隔和“神”的完全的统一性，把希伯来圣经的智能置于更根本的位置，使“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在希伯来的超验的神的观念下得到规定和书写”^⑤。在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化之后，西方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被引向了未来，他们追求建立普遍主义之应然王国，

①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演讲中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神，但每个中国人对“天”的解释不一样，实际上是一种泛神论，也就是说非常主观，你的“天”与我的“天”不一样。结果只能是求同存异，非常有弹性。

② 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③ 同上。

④ （俄）弗·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⑤ 黄颂杰、章雪富：《古希腊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

并在中世纪把生活世界的重心落在寻求天国中永生。这种意识导致西方国家中“不管是圣公会徒还是清教徒，都具有强烈的命运感、上帝选民感和特殊使命感”^①。（三）建立在犹太人契约意识之上的罗马法是西方人文精神的第三个支柱。与中国儒教是用“天命不可违”这种人的内化观念作为保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之间及被统治者之间权利与利益关系平衡不同，西方人在骨子里视“法”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法则、规则或外部强制力。它源于人对未知力量，尤其是人对死亡的恐惧。他们还在精神上将“法”等同于上帝的意旨，认为它代表了人在理性价值上对人性=兽性、个人至上和私欲的肯定。^②总之，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通过理性的“神”化和“法”化、“法”的“神”化和理性化及主体人之自由意志的“神”化和“法”化，在形而上学领域完成了理性与神及法三个思想向度逐渐地融为一体的价值建构，从而使“理性”不断伸展、“法制”不断完善、宗教组织不断深入到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③

出于一种动物的本能，好生恶死，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意志”之一。人不仅在“求生”方面具有共通性，而且，在寻求“生生”和“永生”方面，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求生”意志的表现形态及其选择的“求生”方式方法等却大相径庭。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对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

① Robert T. Handy, *A Christian America: Protestant Hopes and Historical Realities*, New York, 1984, p. 7.

② 这说明了，西方国家的法制要真正地在东方国家生根很难。因为，东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情为本”的文化，只要东方国家的这一文化基色不变，建立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法治社会，很可能变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想。

③ 如霍布斯的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就是基于他个人对人生的推测和想象而推导出来的先验观念，是为了推论的需要而人为建构的概念和理性范畴。这一观念是纯粹理性思辨的产物，并没有历史根据。按照希腊理性逻辑，人可以在自己的观念世界任意地驰骋与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的确就具有某种可以创造一切的“神性”。再如，在西方国家，法代表的是财产的所有者的自然的权利。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道德伦理和政治意识在今天已经变成了西方“普遍主体”的核心文化政治内容，并作为西方根本性的自我认同的源泉之一。参见：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义,对自我和其他人生活的态度等,都不一样。如,中国古代先哲对生命的解读是,“生”乃“天”之“德”或“天之大德曰生”,即,生命现象是“天”、“道”、大自然,自为、自在的存在方式,是宇宙法则自我运动变化的结果。基于对生命本质的这种认识,中国人自古之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求仁”,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生民合其命”、“与鬼神合其吉凶”。即,追求顺应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去享受生命、热爱生命,并为家、宗族、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丁兴旺作出最大的贡献。从“求仁”出发,中国文化视生命为最高原则,自古崇尚厚生与积德,因而,中国人的内心不仅有强烈的民胞物与意识,而且对大千世界万物生生不息,有一种挥之不去、难舍的于穆不已之情。

除了“求仁”,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个主要诉求,是“求道”。而“道”这个中国字,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其含义非常丰富。在学术思想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之“道”的内涵和规定性各不相同,即是说,各有其道,各走其道,而且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总体而言,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大和最深的,是“儒、法、道三家之道”,其中,又以“儒家之道”最能代表“中国人之道”。这个“道”也可以称之为“君子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道”是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也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信奉的“求生”之道。而“君子道”的主要思想内核,除了“求仁”之外,就是“求自己”、“求中”或“求和”。

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求大”是中国文化性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大”。千百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人“求大”思想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政治上,倾向于“大一统”,追求“大同世界”等理想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无数普通民众的血脉之中。精神、灵魂与性格上,不甘人后,争当老大、第一;争强好胜,不愿屈居人下;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崇拜大英雄。审美情趣上,以为大为美。价值取向上,讲究大仁大智大勇、大爱无疆、大隐隐于市、“大医”“医”于无,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大智慧。同时,中国人凡事诉诸情感,讲究是其所是和实事求是。中国人深信,“只有炽热的情感,才能让人做出伟大的事情”。^①

^① (上海)《新闻晨报》,2010年12月3日A24版。

与中国先哲视生命为“天德大化流行”，即“天”的造化不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把生命看做是自然界无处不在的力量间相互斗争的结果。《罗马法》明确规定，“力量”就是权利与正义或“正义乃强者的利益”，从而以律法的形式肯定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正当性。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体现了罗马公民自由意志的“强力”，由古希腊的德性、人之本性变为基督教徒之最高的善。因此，西方人之所求，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即寻求拥有更大的“力量=权力”。17世纪后，欧洲思想家从“我性”原则出发，建立了肯定“强者”拥有更多权利的现代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把西方文化中固有的个人自由主义及视荣誉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的关键的思想推向了极致，使现代西方人的“求生意志”表现为赤裸裸的个人权力意志。但是，“反者道之动”这一宇宙的最根本法则决定了，当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导致其“对立面——普遍的个性的丧失和庸俗化”。^①结果是，西方文化中最根本的“求真”精神渐渐地异化为“真”就是我，我就是“真”。即是说，真理只掌握在我一个人手中，我就是唯一的“神”、唯一的“善”、唯一的上帝代言人，或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上帝。因而，在后现代的西方国家，随着西方文化渐渐地完成了“求我”与“求真”的“合一”，西方人越来越接近于实现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的观念，即“自己决定自己并且是一个完善的个性或绝对的我”。^②

此外，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文化性格除了具有共同的“海盗”特征之外，还各有其自己特有的，诸如“绅士道”、“骑士道”、“教士道”、“酋长道”和“牛仔道”等“求生之道”。

基于对生命“是‘自我’与存在之间的现实联系”的根本认识^③，自古以来俄罗斯人之所求，归结为一点，就是求“人”，这个“人”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外在于己的“人”（外人）或内在于己的“神”（神

①（俄）弗·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79页。

②（俄）弗·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③（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刘小枫主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人)，或是“神的无”等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东西；二是中国“仁学”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是“他人”，即通过在生活中贯彻“他性”原则，而使自己成为有德行的完善之人；三是西方人道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或是说“众人”、具体的人类整体，世界上所有的人，即寻求解救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概言之，俄罗斯人之所求，是外在于己的“人力”与神力；自我人格、道德上的完善与完美；自我和人类整体的救赎与永生。

在日本，基于对自然界中一切存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灵性的生命的根本认识，日本文化“一以贯之”索求的，首先是“神”，这个“神”与西方文化中的神主要指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同，它本质上指的是自然一生命、自然的生命或生命的自然状态；人、现人神一天皇。即，自然界中一切存在——山川河流、植物、生物和动物^①；形式上表现为日本神道和天皇制，即以神道和天皇制来表达对自然一生命的崇敬之情。换句话说，生命、万物在日本先民看来是神皇的显现；“神”就是“天”、就是“德”、“天德”、生命的源泉与归宿。自古以来，除了“求神”，求“直”、“诚”，日本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求人”与“求美”。同时，在日本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求“是”、“实”、“中”、“和”精神，与日本先民头脑中的一些类似的价值取向叠合在一起，成为日本文化精神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日本文化性格的特征在于：宗教信仰上的一体与精神常住感；历史空间上的游离与自卑感；人情世故上的“耻”与无奈感；社会存在上的差异与位置感；物质上的无常与物哀感及善恶不分的是非观、虚置权力的中空观和生死同门、灵魂不灭的生死观等。

二、西方外交文化本原

文化本原是人类思想、理念和自我认识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它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如胡塞尔言：人的“此在”，今生“现世”，“是在无数传统中运动的，全部文化世界的种种形态只是由于传统而存

^① 日本远古时期崇拜的主要是极其淡薄的、植物性的生命，后来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对浓烈的动物性的生命崇拜意识。

在”^①。西方文化建立在理性主义、上帝意识和罗马法三个传统之上，理性主义二元论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首先，西方外交建立在“物有”、“神有”、“我有”三位一体本体思想之上。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关注外在于己的世界整体的存在，并把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作为主体人的思考对象，即通过把存在主、客化，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世界万物的本质及宇宙间力量与秩序生成的根本原因。古希腊人由“对外物的惊异与着重”，关注世界“本体”——“实在”或“最后真实的存在”，孜孜以求地“探索不变的对象存在的真理和真实”或“超越的静态的具有终极目的性的永恒存有——‘不动的动力来源者’”（Unmoved Mover）。^② 自古以来，西方先哲不仅探寻一个终极存在之物质或精神实体，而且将此实体视为天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与目的。从泰勒斯以降，包括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等古希腊哲人，以诸如土、火、气、水、“无定形”、数和原子等物质作为世界生成与发展之源。与此同时，古希腊哲人克赛诺芬尼、巴门尼德、阿纳克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在探究宇宙动因时，将“奴斯”、“爱与憎”、“理念”和理性（灵魂）等精神实体，作为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本原。他们还强调本体的个体性，认为个体只属于它自己和那个以它为本体的东西，并以追求“超感觉”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终极原因、终极真理为己任，从而确立了以后西方个体主义之思及“神本论”的基础。17世纪初，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倡导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按照这种意识追求自我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标志着西方理性主义发展进入新时期。18世纪后，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代表了西方理性主义本体思想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最高成就，并把理性主义对西方秩序的“普遍性”的自我论述推向顶峰。

自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哲学面临着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与多元系统的外在冲突的双重困境下，西方现代哲人开始进行一场以解构理性为主旨的，所谓超越理念（柏拉图）、心物二元（笛卡尔）、知识架构（康德）、精神

① 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② 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第四卷《本体诠释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后来，它与希伯来的上帝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超越的创造主——上帝或人格化、价值化的神。

本质（黑格尔）的思想运动。^① 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西方国家出现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社会思潮中，诸如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过程哲学和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学派都倾向于非理性主义。20 世纪后，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都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形式。

“神我”与“自性”的合一^②，上帝意识和古罗马扩张精神的融合是西方各国文化生成和发展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③ 作为西方文化集大成者，美国社会中支撑“神我”与“自性”合一的根，扎得比许多西方国家更深；上帝意识和古罗马民族扩张精神的融合在组织上也更为严密和广泛；不仅存在多种盘根错节的表现方式，且各种方式之间还形成了纵横交错、相互作用的关系，因而也更为有力。美国民族主义者在心灵深处习惯于“从自我本身的能动活动来设定‘非我’，并最后又复归到‘绝对自我’”。^④源于欧洲文明与北美洲荒野殖民双重历史经验而产生的美国战略文化的根本特性在于：一方面，西方文化内在的，诸如理性（科学理性）与血性（非理性）、“神我”与“自我”的张力，不仅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得更加显明、尖锐与突出，而且在形式上呈现出更高程度和更加紧密的相互渗透、融合、重叠与共生；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共有的文化要素与美国立国后产生的特有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双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西方文化中理性、上帝意识和罗马法精神三者之间的张力及其相互渗透

① 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第一卷《论中西哲学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页。

② “神我”与“自性”，印度神话、宗教中的两个主要概念：前者有精神、我、人的意思，后者有“自然”、“物质”的意思。

③ 为了给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找到合法性，资产阶级需要使物质占有神圣化，并为此与宗教和上帝实现和解。海涅第一个明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的这一政治需要，调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也就是与封建农奴主和教会实现和解。人性与神性必须统一。海涅：“我们的一切新制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获得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和精神和好如初。‘神我’将再次和‘自性’结为一体。”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4 页。

④ 陈秀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6 页。

的深度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更加突出，并造成美国外交战略中内向、保守的孤立主义倾向与外向、扩张性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长期并存。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子”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仅一贯高扬科学理性精神，使之成为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而且将西方理性精神所内涵的征服自然意识，扩展为寻求征服、控制、同化世界上其他非我族类。这种自我扩张意识与美国早期移民向西部拓疆过程中，大规模灭杀北美印第安部落人群而形成的嗜血牛仔精神融为一体，使美国战略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扩张冲动更具“兽性”。伴随着这种“兽性”的不断强化和普遍化，美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强调全胜和消灭敌人群体。同时，美国社会文化中也出现了较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广泛和坚固的结构性“暴力文化”。

英国政论家提摩许·加顿·艾什就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理查德·珀尔所谓美国外交政策核心是“美国原则的普遍化”指出，“这些‘美国原则’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老的欧洲政策的新版，有些还是经改装后正在欧洲应用的老美国原则；欧洲民族主义或欧洲戴高乐主义不仅仅‘志在美国’（抗衡美国的力量），在一些曾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里，精英人士把实现世界性影响力这本身就看做是目的。”^① 艾什的评论不仅揭示了欧盟主要国家与美国在战略文化方面存在的历史联系，而且还道出了被当下欧美对外政策表面分歧所掩盖的欧美战略文化本质上的同一性。

追根溯源，欧美文化本质上的同一性出于“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国家形成的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政治传统”。^② 如罗伯特·卡根言：“欧盟是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的产物。”目前，欧盟对外强调谈判，重视外交和商业关系；强调国际法，摒弃实力；强调说服，不进行威逼；强调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但这不是欧洲人对国际关系的传统看法，而仅仅是近代欧洲历史的产物。当前，一方面欧盟每个成员国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着自己在国际上动武的传统和战略偏好——自己的文化立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欧盟正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朝着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行为体的方向发展。

①（英）提摩许·加顿·艾什：《自由世界——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张宁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②（英）阿诺尔德·J. 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8页。